

大時代的悲劇

陳布雷與女兒陳璉

紅魔劫終篇

陳布雷服藥自了斷

陳璉進到國立編譯館後，在南京中山東路也租了房子，安下了她和袁永照的小家庭，把頭生的孩子留在慈谿仍請自己的外婆照顧。陳璉經常收聽到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本來決定按照上級指示，安心的「靜以待變」（即長期隱蔽在南京迎接解放）。陳布雷也告訴過她們夫婦二人說：「你們就在南京，那裡也不要去，那裡也不能去。」

陳璉和袁永照也體會出陳布雷這話的意思，是蔣介石把他們交給陳布雷在南京加以管束，「那裡也不能去」就是這個意思。他們如果秘密離開南京（事實也不可能），將給陳布雷留下難題。十一月十二日，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後，翁郁文（即喬石的夫人郁文，與翁澤永為兄妹）奉上級組織指示，以吊唁舅父陳布雷名義從上海到南京，在靈堂裡和陳璉與袁永照夫婦取得聯繫，共同分析了形勢，認為陳布雷一死，蔣介石就會置陳璉夫婦於死地；而且陳布雷已死，他們夫婦

趁此時秘密離開南京，也不引起人注意。

於是就在陳布雷死後三天，陳璉和袁永照化裝由南京到了上海；陳璉為了向編譯館交代，寫了封信給同在國立編譯館工作的李純武，佯稱將去「台糖公司工作」。在中共

上海局地下交通的精心安排下，由翁郁文護送陳璉、袁永照夫婦二同志（共三人）；陳璉化裝成一個農村婦女，頭上頂個白毛巾，上身穿個短襖，三人在鎮江過江，到達設在蘇北淮安下河鎮華中工委。華中工委接待了他們，決定仍由翁郁文護送陳璉和袁永照到黨中央所在的河北平山，臨出發時，又增加了李琦濤等三位同志，共六人同行。他們由蘇北步行，穿越硝煙方盡的淮海戰場，路上不斷遇到成群結隊的國民黨俘虜兵。偶而遇到一輛順路的卡車，他們也跟著各色衣著的人群一擁而上，參與擠沙丁魚的行列，密密實實擠在車廂裡，連胳膊腿都動彈不得。就這樣，他們六人到達設在山東兗州的華東局，轉赴石家莊。當時黨中央設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他們在石家莊聯繫結果，上級通知他

● 劉民達

們中共中央正準備轉往即將和平解放的北平，要他們加入向北平進發的大隊人馬之中。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北平解放，陳璉和袁永照等人二月中即進入北平。

從這年春天開始，陳璉在北平出席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全國青年代表大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以及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成為青年和學生中的活躍分子。四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後，陳璉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并任常委，初任團中央文教部秘書主任，後調任少年兒童部副部長、部長，對創建少年兒童先鋒隊作出了重大貢獻。

以後，陳璉又任全國政協第二、第三、第四屆委員，并任全國婦聯第四屆委員；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一九五六年二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陳璉為了幫助當時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惱和悲觀御掉思想包袱時說：

「也許在座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陳

布雷的女兒。在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爲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感覺到，正是因爲黨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爲歸依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

陳璉的發言受到周恩來同志的稱贊，并被《人民日報》予以摘要刊登。

爲了政治夫妻決裂

一顆出自國民黨高層人士家庭的政治新星正在升起，而毫無情義的政治風暴卻對著陳璉和袁永熙以及他們在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的戰友、朋友、同學鋪天蓋地而來。

袁永熙到北平後，一九四九年四月，也被選爲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工作幾經變動，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到清華大學任青年團團委書記，一九五五年後，任校長助理（校長爲蔣南翔）。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在清華是「取得豐碩成果」的，教務長錢偉長在列，身爲中共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助理的袁永熙也列名其中，并在《中國青年報》上享有大篇幅的報導。在處理右派中，袁永熙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宮一個中學去任教。陳璉和袁永熙的家庭破裂了。爲了

和右派的袁永熙劃清界限，陳璉給組織寫報告，決定和袁永熙離婚。

反右後不久，陳璉拖著三個孩子（一個女兒，兩個兒子）與袁永熙離婚。

下面引陳璉的老同學、老戰友古念良的一段話來幫助我們了解陳璉與袁永熙離婚事實經過。

一九五七年，袁永熙已被錯劃成右派，而我還沒有被揪鬥，邢方群同志告訴我：陳璉爲了要劃清界限，已經給組織寫了報告，決定和袁永熙離婚。事實說明，這次離婚，在陳璉方面，完全不是由於感情的破裂，而純粹是爲了服從黨的利益。一九六二年，陳璉要求調去上海，臨走前一天，她托袁永熙的外甥女孫士洵通知袁永熙跟三個孩子聚會一天。她一清早便把孩子交給士洵，然後，晚上又從士洵手裡接回孩子，這樣，她就避開了和袁永熙直接會面。後來，士洵的媽媽袁永怡同志告訴我：當天晚上陳璉抱著士洵哭了一個通宵，淚水濕透了士洵的睡衣……

那麼，照古念良的說法，陳璉與袁永熙的離婚，「純粹是爲了服從黨的利益」；而袁永熙的表妹則說：「陳璉和袁永熙兩個人脾氣都太倔，個性上合不來。」實際上，陳璉和袁永熙是同在一個黨內的兩種類型不同的黨員。

袁永熙在北平自由民主的清華大學內長大，又在號稱「民主堡壘」的聯大讀書。袁

永熙是從自由民主的角度來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而加入共產黨的。

陳璉是從「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找到了共產黨」的，甚至她在政治啟蒙即投入到共產黨組織之中，沒有處過像清華大學那樣的自由民主環境。袁永熙在一九五七年之被劃爲右派者，此歷史之必然也；陳璉爲劃清界限與袁永熙離婚，亦歷史之必然也。他們的結合，是在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上的一致；而他們家庭關係的破裂，則是共產黨從一九五七年推向極左道路的必然結果。他們的悲歡離合，個性的因素是有關係，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在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波浪中的一場悲喜劇。

陳璉的大兒子陳必大關於他父母的離異寫道：

「我的雙親個性都很強，若不是長達八年風雨同舟的革命鬥爭歷程，他們本不會走到一起的。解放後，左的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外部的敵人打退後，內部的整肅越來越擴大化，我的父親也被捲入。失去了共同的奮鬥目標後，父母之間在個性上的差異顯得更突出」。

陳必大分析他父母的離異，是因爲在「失去了共同的奮鬥目標後，在個性上的差異顯得更突出」，似乎還沒有「上網」。

哀樂中年包袱愈沉

一九六〇年，陳璉已經是四十一歲的人

了，在青年團工作已不適合，調到林業部主任教育司副司長，一九六二年，又調到上海任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副處長，陳璉本來就是比較內向的人，一九五七年以後，她變得更加為深沉，更不大說話了，強忍著內心的痛苦，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用於工作，用於學習，用於教育自己的子女。陳璉是個柔中有剛，富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富於理想，有著熱烈和執著追求精神，把革命事業看得高於一切的人。

自經了一九五七年的經歷和打擊之後，陳璉被捲進左的迷魂，陳璉只有更深的來自責、自勉和自勵了。隨着極左思潮的上升，陳璉內心的家庭包袱也愈來愈重，愈來愈怕觸及到父親的問題。特別在經過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風浪之後，陳璉真是畏「家」如虎；畏父親的家這個歷史大包袱，畏自己的家這個新包袱。正如陳必大所分析的：

「媽媽（即陳璉）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時代要在她與家庭之間演出一場悲劇。之所以是悲劇，是因為站在敵對政治營壘中的父女，在道德感情上是相通的。媽媽（即陳璉）景仰外公的私德，她盡量不在我們面前提到外公，因為她很難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外公作為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員，卻並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像的「壞人」。外公的死，證明她（陳璉）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今後她更可以義無反顧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總覺得若有所失：外公

這樣一位正直愛國的舊式知識分子，可惜走錯了路而成為舊制度的殉葬品。但這不是悲劇的終結，媽媽投身革命後失去的不僅是外公，還有她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生命。」

是的，作為父親的陳布雷在國共兩黨鬥爭的政治風暴中，成了「舊制度的殉葬品」；作為女兒的陳璉，雖在兩黨鬥爭中成了勝利者之一員，但卻在「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Rerelutions Within Chinese Revolution）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史》語）中，「失去不僅僅是外公（陳璉的父親）還有她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生命。」

陳璉像清教徒般的虔誠接受來自一九五七年的「家破」與生死與共戰友們的沉淪，又像秋風中的落葉一樣，在《革命中國的興起》（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費正清語）與《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中，為蕭瑟的寒風捲來捲去。

一九六二年春，陳璉帶著大的只有十二歲，小的只有八歲的三個子女，由北京林業部調到上海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任副處長。部長夏征農是三十年代的上海老作家，是位理解人和與人為善的老同志，而這時的華東局書記正是以左聞名的柯慶施。辛子陵的《毛澤東全傳》說：「中共高層幹部中承歡媚上之徒，柯慶施是個代表人物」（該書卷五一九九頁）。這柯慶施遠的不說，就在調華東局書記之前，原為南京市長和市委書記，曾博得「柯市長嘴裡沒有講過一個人的好」

的令譽；又有人說：「你跟柯市長工作，作錯了你倒霉，作對了你也倒霉」；更有人說：「跟柯市長工作，晝夜都提心吊膽的。」這都是與柯慶施有過接觸的人經驗之談。一九五二年夏季南京的院系調整時，市委宣傳部有人僅僅說了句「舊大學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但長期實行以來已有些適合我們中國的特點。」柯慶施一聞此言，大興問罪之師，說「這是懷念舊大學，懷念舊制度，說這話的人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內的代言人。」就是這個柯慶施，要問他到底要把中國革成什麼樣的社會和國家，看來他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

實際上，他是迎着某種上方的需要，把具有近代知識與思維能力的人，改造成為愚昧落後的小農經濟社會的「鄉愿」。為什麼浩劫深重的文化大革命起於上海，柯慶施是不能辭其咎的。

一月風暴打入牛棚

一九六六年初夏，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陳璉從安徽全椒農村社教蹲點中回到華東局機關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兼上海市委書記和華東局宣傳部長的身分，點名說夏征農在三十年代就有問題，破壞樣板戲。張春橋煽動宣傳部貼夏征農的大字報。經過幾次揭發和批判夏征農的會議後，陳璉一直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張大字報也不貼，私下對別的同志說：「我覺得夏征農這個人

不錯，很民主，很放手，在他領導下工作心情舒暢，我不知道現在爲什麼要這樣搞？」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後，陳璉進了牛棚，造反派要她鬥私批修，她很直率的說：「我想不通，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努力按照黨章的要求去做的，怎麼一下變成了修正主義？陳璉作爲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太不懂通時達變了，也太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了，心情變得十分的嚴峻。四月，陳璉的大女兒必泓所在學校就傳出陳璉是「判徒」的流言。八月，陳璉和胞姐陳琇見面時，神情就更爲嚴肅，更少說話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間，華東局機關的造反派和北京到上海的「抓叛徒」紅衛兵抄了陳璉的家，原以爲會抄到一些陳布雷的文稿，結果一無所獲，於是就開始審查陳璉被捕的問題。陳璉開始以爲造反派不過從《中央日報》上看到蔣介石夫婦接見陳布雷遺屬的照片與報導，後來聽說造反派從剛抄出的陳布雷日記中「發掘」出了「陳璉秘密自首」的新「證據」。陳璉的兒子陳必大記述稱：

「幾天後，媽媽（即陳璉）來找我了。她的神情有些異樣，平靜中摻着幾分痛苦，幾分無奈甚至是幾分揶揄。我開始以爲她還得教訓我一頓，不料說了幾句後，她忽然問：『你聽說了關於媽媽的什麼事嗎？』我茫然地搖搖頭，心中一陣恐慌，又有什麼事了？『你姐姐已經問過我了……』媽媽看了看，『你不是想知道嗎？』『是不是關於陳

布雷？』我噤噤嚅嚅極不情願地反問一句。

「唉！」媽媽輕嘆一聲未置可否，考慮著怎麼樣跟我談。我原以爲我會一句句地問下去，可誰知我卻極力閃避，像是在受審似的，過了半晌，她忽然問：『你到北京，去看你父親和你姑姑了嗎？』「沒呀。」我心裡又是一陣恐慌。過去只有當我們使性子不聽話，惹她生氣時，她才說：『你走吧，找你父親去吧，你不聽我的話，我們家裡不要你，』這次顯然不是恫嚇，也許是要談被捕的事，勾起了她對往事的回憶和對父親近況的牽掛。甚至她可能還想到萬一她倒下去了，不知父親那裡的處境能否允許他給我們一點照顧……。媽媽被自己的提問引入了深長的思考……。與媽媽作這樣的談話，我難受極了。媽媽看到這付忐忑不安，木然枯坐的樣子，知道我已感覺到發生了某種事態，卻并不想，或許說不敢追問下去……。看來這次談話是難以爲繼了……。最後，媽媽說：『我被捕前後的表現，一九四九年組織上就已經審查過，早已作過結論。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組織上還要再審查，我們也應愉快的接受……。你也要相信你媽媽是對得起黨，是問心無愧的……。萬一有人說媽媽有什麼問題，你們也要有思想準備……。』

抗議被陷自絕明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是個陰沉沉

的星期天。那天我沒有回家，……，在學校……百無聊賴，心神不寧。半夜裡，漆黑空蕩的走廊上忽然傳來一個女人淒切的哭喊，是在叫我的名字，像招魂一樣，可怕極了。我起先以爲是夢境，後來同屋的同學開了燈，也在叫我。看見燈光，我家的阿姨摸了進來……，又急又怕，哭喊起來：『家裡出事！你媽媽生病住院了。』……天亮後，我們到了殯儀館，媽媽靜靜的躺著，穿着新衣裳，額角上有一處青腫，臉色蒼白，雙唇緊閉，好像強咽下所有的痛苦！」

陳璉的女兒陳必泓記述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我還在夢鄉中被叫醒，說是有我的長途電話，母親病危，速回。我當時預感到大難臨頭，心神恍惚，急急忙忙的乘長途汽車趕到家。我心神緊張的走進家門時，見到姨媽、姨父、弟弟們都已在了，還有華東局機關的幾位同志。窗子打開著，桌上堆着亂七八糟的紙，然而媽媽卻已經不在了，永遠永遠的離開了我們，桌上留著媽媽的遺書。

「同志們：

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一九四九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陳璉絕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陳布雷自殺身亡後，陳璉給姐姐陳琇的信上說：『我所覺得最無可挽回的事，是父親一生憂患，不能

見到祖國將來欣榮的日子。」

陳琇說，陳璉的這話很可以概括她多年來矛盾心情。

陳布雷和陳璉父女二人，在中國近代社會洶湧澎湃的浪濤中，都躍身投入到波濤之

中，而卻都為這浪濤所吞噬，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人說，陳璉的一生實現了三決裂：與階級決裂，與家庭決裂，最後與人寰決裂。信哉斯言！作為國民黨要員的父親陳布雷的

自殺，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是主要原因，但無可否認，也包含有其作為共產黨員女兒陳璉的原素。同樣，作為共產黨員的女兒陳璉在「文革」中自殺，當然顛倒黑白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原因。

中外名人傳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